




卓越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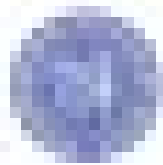
镀金时代的精神档案

DUJIN SHIDAI DE JINGSHEN DANG'AN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文红霞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健全时代的精神独立

张其成 著

张其成

张其成

张其成

张其成

张其成

张其成

张其成




卓越学术文库 ■

镀金时代的精神档案

DUJIN SHIDAI DE JINGSHEN DANG'AN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文红霞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镀金时代的精神档案/文红霞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 11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3740-1

I. ①镀… II. ①文…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1798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7.75

字数:340 千字

版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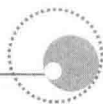
印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3740-1

定价: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自序



时间是经，空间是纬，每个行走在时空之网的我们其实是孤独而又脆弱的。我们互存戒备但又渴望温暖和爱。我们在自我的世界里起起伏伏，却也极想探知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思想和情感。如此一来，阅读就是最便捷的桥，是最无负担的倾听与诉说，是最惊艳的邂逅和最靠近灵魂的拥抱。

有些书明明是初次阅读，却如同经年好友雪夜谈心，一盏梅花酒，几杯香醇的绿茶，瞬间熨帖了身心。

有些书让你拍案叫绝，空余怅叹，如此文字如此故事为什么不是出自我的手？

有些书如同一块硬石头，猝然间劈空而来，砸得你生疼。却也砸破了罩在你浑浑噩噩的日常舒适生活的玻璃罩，得以看见另一方世界，另一种人生。

还有些书则是温润的玉石，让你爱不释手，反复把玩间也烙上了你的体温和眷恋。

爱书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的懂得未尝不是跨越时空的另一种奇妙的邂逅。

我想描述出这些感受，这些曾令我笑、让我泪，给过我疼痛、却又吻我以甜蜜的阅读时刻。或许就论文体而言，它们不够谨严，因为掺杂了太多个人的情感和近乎固执的坚持。但那份对文字的单纯而炽烈的热爱都在这里了。也算是我对自己这几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卑之无甚高论，纯属一得之见，敝帚自珍，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感谢河南省教育厅后期资助项目组的慷慨资助，感谢郑州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辛苦付出，这些文字才得以出版。致以衷心感谢。

文红霞

2017年10月19日



大众文化传媒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	1
镀金时代的精神档案:重读《废都》	10
狂欢的《酒国》	23
《檀香刑》的声音与结构	33
叠影在诗与思之间	42
阎连科的悲剧意识	51
《丁庄梦》的苦难与救赎	57
《狼图腾》点燃生态狼烟	63
人间深河的悲哀	74
小人物的梦想	83
跑步穿过中关村	89
女性生命本体的探问	97
迟子建的生态写作	112
“作女”陆小曼	145
掳爱:才女的命运转弯处	152
视角旋转的瑰丽:严歌苓	158
《无极》:一地光怪陆离的碎片	188
海角·情书·野玫瑰	192
徜徉在芒果街	200
别样的荒凉与丰美:萧红论	202
《沉没之鱼》:文明与生态的冲突	213

《妇女小传》:打捞被历史遗忘的女性	222
被弃才女卓文君	227
惯爱“痴人说梦”的晏小山	235
浴火重生的爱与美	245
帕慕克的迷宫	254
看何炳棣怎样读史阅世	261
靠近灵魂的阅读	265
批评主体的生命在场——论吴义勤的文学批评	270

大众文化传媒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



无可否认,今天大众文化传媒不仅作为语境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迅捷的方式,也以无孔不入的力量介入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在这个事实面前,有论者称:

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

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①

我们已经进入“图像时代”,而文学在图像的冲击下发岌可危。^②

另有论者则说:

对文化研究来说,解构现成的经典观念,把经典“祛魅”乃是一个正当的要求。^③

一面是经典终结的末世危言,一面是经典祛魅的殷殷呼唤,孰是孰非?

笔者拟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述:中国新时期文学是否有经典?大众文化传媒的勃兴带给新时期文学怎样的影响,还将怎样影响未来文学的发展?此类问题是近年学界争议的热点,众说纷纭,不乏洞见,但全方位的深

①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第9页。

② 吴昊:《图像与文学关系的历史考察——兼谈文学在图像时代的生存策略》,《文艺评论》,2007年第3期,第18页。

③ 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第30页。



度思考并不多见。

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一个既成的历史现实

基本概念的厘清是展开论述的前提。何谓经典？词典中解释为权威的，带有典范意味的作品^①。但若以此来界定经典，会遇到一个棘手问题：遴选经典的评定规则和价值尺度总是随时代的演变在变化，永恒意义上的经典很难实现。西方关于经典的论述较有代表性的是布鲁姆和布迪厄。布鲁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发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②。而“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标准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③。这一论断为经典阐释的突破留下了一个理论缺口，因为这看似普遍客观适用的理论标准实则滑入了主观主义的陷阱。而在布迪厄看来：

艺术品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然的艺术品的价值。因为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养和能力对于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④

这一论断也将面临诘问：我们能否对每个经典进行语境还原？

因此，“经典”虽有权威、典范的含义，但并非凝固不变的，它们在被阐释被接受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开放性多元性特征。经典的价值“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⑤。由于大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参与和影响，中国新

① 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权威性的。传统文论中所谓“经”意味着：“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谓“典”的本义则是“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经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经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④ [法]波埃尔·希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⑤ 吴义勤：《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



时期文学经典的多元特征尤其突出。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文学的开启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断代,也是经历了十年断裂后文学意义上的复苏,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报刊的复刊^①。同时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各种西方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作品被大规模介绍进来,也包括以三毛、琼瑶为代表的言情文学,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传奇等,带给中国的读者久违的新奇,也带来了以码洋、销售额亦即市场原则构建起来的畅销书运行机制。可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之初与大众文化传媒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王朔被认为是大众文化的开先河者,《渴望》的成功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正式登场的标志。”^②文学创作是为大众欣赏消费的商品,作家也需要将苦心经营的成果换为稻粱谋,这已成共识。此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全面转型与变革,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大众文化传媒迅猛发展与扩张,这一切深刻影响了作家的精神内蕴和书写方式,并直接参与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历程。应该说,历经三十余年的萌生与勃兴,曲折与发展,繁盛与辉煌,中国新时期文学已铸就了大批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价值都值得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文学遵循自己的规律也已走过了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读者在这个时间里,已经通过阅读实践对文学作品进行了遴选和检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历程也就是一个在不断遴选、沉淀与检验中走向经典化的历史事实。

然而这一段文学史的成就屡遭贬抑,非议甚多,这其中有过于苛刻或追求完美的心态,也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偏颇之见,比如粗暴简单地地下结论“大师缺席”“经典匮乏”^③。事实上,偏激指斥无济于事,我们需要实事求是面对这一文学历史,以客观理性公允的态度追问其渊源成因、表征形态及优劣得失,并不断超越时代和评论者自身的局限,对经典作品做出遴选,考辨其经典化的历程。

大众文化传媒影响新时期文学的方式

所谓经典化即转化为经典的过程。接受美学的提出者尧斯指出,作品

① 这些媒体主要有:《世界文学》(1977年7月);《文学评论》(1978年2月);《钟山》(1978年3月);《文艺报》(1978年7月);《十月》(1978年8月);《收获》(1979年1月);《电影文学》(1979年4月);《文艺研究》(1979年5月);《散文》(1980年1月);等等。当时创作界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诗刊》在1976年1月便已复刊。

② 陈刚:《大众文化与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③ 如田崇雪:《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经典”匮乏的原因探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文章以出身论作家作品的优劣,将当代文学缺乏经典的原因归结为“小农意识太重”“小资情调太浓”“贵族精神阙如”等。



价值必须在读者那里实现。但被读者接纳的作品就是经典吗？反对者可以举出足够多的例子来说明作品在一段时间寂寂无闻，而在多年后绽放光彩。很多作品虽喧嚣一时，却在多年后被证明无价值。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几乎南辕北辙的分歧？有没有一种普适的，既公正又科学的评价标准？这常使研究者顾虑重重，也使评论界内部分歧丛生，冲突不断。这种矛盾的现象到了新世纪更增添了难度。大众文化传媒的兴盛使文学批评演变为一种模糊美学，几乎有人厉声批评，立即就有人倾情回护，有人大声叫好，就有人反唇相讥。很难再见到众口一词的称赞或一边倒的批评。这可视为当前批评的多元化和更加开放的姿态，但无疑增加了文学经典化的难度。但若认可“在判断之间出现冲突，这是科学发展的刺激因素之一”^①，那么难度正是文学经典化的魅力之所在，因为关于经典作品的共识与争论也正好带来了选择和思辨的快乐。

归纳起来，大众文化传媒影响文学的运作策略主要有：

1. 强大的舆论优势

大众文化传媒往往以豁人眼目的事件或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来阐释或参与作家作品的评价。一方面，我们清晰地看到，新时期文学与大众文化传媒结盟，极大地拓展了写作空间，使自己的作品迅速广泛地为读者所接受。王朔谈到作品与宣传的关系时说：

这一招相当管用，九二年我见了足有两百名记者，都见到了，大报小报，北京外地，同一张报纸见了文艺版见影视版，见了副刊的见周末版，自己也说乱了，唯恐红不透，唯恐声音不能遍及全国城乡各地。与此同时，图书销售应声而涨，每本涨破十万大关，且持续节节上升。^②

但是舆论也可能抹杀文学本身的意义。

作为九十年代的主要的文化现象，顾城之死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家庭悲剧的意义，而成为后乌托邦时期的文化危机不断深入的呈现。^③

1993年，曾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童话诗

① [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③ 陈刚：《大众文化与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砍死妻子后自杀。血腥事件伴随三人行的恋情被媒体演绎,顾城遗作《英儿》上市,英儿带着新作签名售书。顾城实际上被妖魔化,他的诗歌价值被淹没在事件的热炒中。

此外,《苦恋》风波,《废都》现象,葛红兵“悼词”事件;“二王之争”“韩白之争”“金余之争”;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等规模不一,都有其利也有其弊,就像一个放大镜,既让大众看到了细微真相,也容易过度阐释,甚至引起另一种曲解。

2. 新奇的命名

大众文化传媒出于营销策略,常会设计出新颖的命名夺人眼球,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状态小说、新世纪文学、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等。“影响的焦虑”几乎无处不在,当事人都急于挣脱前辈经典的阴影,又急于占领自己的山头。而命名权往往由大众文化传媒掌握,其命名策略当然是吸引人眼球,制造亮点、热点,不断寻找受众的兴奋点。

但也应看到,一个好的命名往往会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它就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把众多志趣相投的同人集结旗下,许多作家也在此种热情的激励下写出了自己写作生涯中至为重要的作品,也共同推动了一种思潮或者流派的兴盛。比如韩少功、阿城、莫言等与寻根小说;余华、苏童、马原等与先锋小说;刘震云、池莉、方方等与新写实小说,韩寒、郭敬明等与“80后”写作,一批优秀作家被隆重推出,并从身份上予以界定,大批作品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经典。这些命名也往往成为被大众认可的文学思潮或流派,成为标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个闪亮的路标。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根据它们按图索骥,描画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地图。

3. 影视和网络游戏等对文学作品的改编

正是伴随着《红高粱》扬名西柏林,《大红灯笼高高挂》称雄威尼斯,《来来往往》、康熙雍正等帝王系列、《玉观音》《新结婚时代》《蜗居》等影视剧的家喻户晓,莫言、二月河、刘震云、刘恒、王朔、池莉、海岩、苏童、王海鸰、六六等一批作家声名鹊起^①。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才知晓了这些作家及作品。丹

^① 新时期以来,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先后有:《小花》《天云山传奇》《内当家》《人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祸起萧墙》《青春祭》《女大学生宿舍》《红衣少女》《人到中年》《青春万岁》《老井》《花园街五号》《神鞭》《哦,香雪》《凤凰琴》《红粉》《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山那人那狗》《盲井》《周渔的火车》《霸王别姬》《英雄》《集结号》《天下无贼》等;改编的电视剧有:《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凯旋在子夜》《雪城》《便衣警察》《过把瘾》《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永不瞑目》《来来往往》《小姐你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新结婚时代》《牵手》《黑洞》《蜗居》等。





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由此带来深刻的文化转型和变革，由此产生马克·波斯特所言的“文化重组”。

影视改编实际上就是加速其市场化的催化剂。池莉的《来来往往》发表于《十月》1997年第4期，被各种文学期刊转载，十六家影视投资公司赶往武汉洽谈改编事宜，从争夺改编权，到挑演员，各种新闻不断，作品被大炒特炒，小说两年内发行二十三万册^②。随着《生活秀》《小姐你早》《口红》等热播，池莉小说累计销售百万册以上^③。《激情燃烧的岁月》热播时，石钟山的《父亲进城》卖得火爆。冯小刚的《天下无贼》让原本寂寂无闻的赵本夫一举成名。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网络也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它传播速度迅疾，阅读与书写无阶梯，以强大的渗透力穿越私人空间，晾晒在公众面前，不仅极大地改写了我们的时空观念与认知模式（像影视所能做到的），还直接干预、改写普通人的现实人生。比如木子美在博客中国发表自己的性爱日记，迅速成为网络名人。芙蓉姐姐贴在校BBS上的自恋照片也让她一蹶而红。“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地私人化了。”^④传媒载体的不断更新换代及其变化多端的组合方式也给当前文学提出了新课题。比如痞子蔡、当年明月、慕容雪村、安妮宝贝等的作品即先在网络流行，这之后出版发行并畅销；有的成为电影市场、网络游戏开发的宠儿。

共谋与抵牾：大众文化传媒时代的文学经典

1. 共谋

其实在对新时期文学的传播、改编和塑造中，很难分清哪些是大众文化传媒施加给文学的影响，哪些是作家的主动选择，或者用“共谋”一词更为妥帖。对大多数作家来说，拒绝大众文化传媒带来的现实诱惑是很艰难的，毕竟名声意味着资本。“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气候决定着该时代一般作家的文学命运。”^⑤推广并提升自己的名声资本成为很多作家的选择甚至追求，借助作品研讨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② 陈飞：《〈来来往往〉的故事》，《大众电影》，1998年第5期，第33页。

③ 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④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⑤ 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会、书展、获奖、讲坛等包装、推销、炒作成为常态，因此出现一批明星作家，比如王朔、池莉、易中天、于丹、阎崇年、马瑞芳等。影视成为其拓展写作空间的一条途径，一条通往名利的光明大道。王朔曾说过一段不无偏激的话，却很好地表达了作家对影视的主动贴近和应变策略：

一落笔就不能容忍哪怕一页平淡无奇，要么有激情，要么有悬疑，要么有机智，要么有幽默，再不济也要有无耻，不能让读者愉悦，也要让读者吃惊乃至激愤憎恶。煽他们的情，煽他们的欲，七情六欲，煽着谁是谁。^①

诸多作家为了获得改编，也积极在书写方式上予以改变，很多人不幸滑入了另一个泥潭——媚俗，即米兰·昆德拉所言的“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甚至出现张艺谋重金悬赏下多位作家争写武则天的局面，不能不说滑稽^②。

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上面的论述，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所谓经典分明处在大众文化传媒翻云覆雨的肆意摆布下，何来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但是我们若放出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大众文化传媒之于文学经典的作用，就会发现，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人的作品还能流传至今并对我们产生影响，证明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大众文化传媒对文学经典制约的有限性。

正如范伯群所说：“文学商品化是天经地义的，这丝毫不会亵渎文学。”^③作家并非一味屈从影视，而是将自己的智慧、个性、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带进影视创作，从而使影视品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有论者说：“没有八十年代小说的繁荣与创新，便没有第五代导演的辉煌。”^④没有好的故事，好的剧本，再出色的导演也难做无米之炊。张艺谋对新时期小说的情有独钟即是例证。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话语专断，但是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的发掘与阐释永远是经典化的一个

① 左舒拉：《有人喜欢有人愁的王朔及其电影》，《电影艺术》，1989年第10期，第25~26页。

② 1993年，张艺谋命题作文约请六位作家写作武则天，苏童的《紫檀木球》（《大家》创刊号），北村的《武则天——迷津中的国王》（《小说家》1994年第4期），格非的《武则天》（《江南》1994年第1期），赵枚的《则天大圣皇帝》、须兰的《谁想毒死我》（开明出版社出单行本），钮海燕的《中国女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单行本）。转引自陈墨：《张艺谋电影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③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④ 黄书泉：《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重要环节。即便是那些去经典化的改编、戏说、大话之类的作品在消解了经典的同时,也在改编与阐释中激活了经典,从另一个侧面推进了经典的再生产。

2. 抵牾

经典具有一定美学素质,读者在阅读中认识自我,获得心灵的抚慰。但并非这样的作品都能成为经典,这就取决于在特定的历史境遇里作品自身的命运。其被读者、文学研究者、文化传媒、评奖机制等选中的机遇。如果不幸被埋在时间的黄沙里,从此湮没无闻,那也就无法称之为经典。这也给后来的文学研究者预留下极大的研究空间,他们需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永远是不断发掘、打捞那些错过了自己的历史情境而被埋没的文学经典。比如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师陀等人的重新发现和极力推崇。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有幸被选中的作品就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吗?常常见到有喧嚣一时的作品转瞬成为过眼云烟,狂轰滥炸式的舆论宣传、铺天盖地的炒作是有时效性的,雾消云散之时往往是那被吹胀的气球破败之日。金庸《射雕英雄传》的热播引发了阅读热潮,也引起学者严家炎、陈平原等的关注和研究。而《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无极》《三枪拍案惊奇》等票房极高,却因艺术审美的不足无法成为经典。这也说明了另一个前面我们曾论及的话题: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经典,经典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永远需要不断挖掘,不断发现和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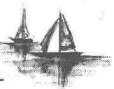
这里涉及一对名词的甄别,我称之为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和读者意义上的经典。我想以莫言的《红高粱》和阿城的《棋王》对比研究。就作品品质而言,两部作品在伯仲之间,莫言文字的恣肆放纵,想象的奇诡瑰丽,和阿城文字的沉静古雅,文化内涵的深邃厚重,各有其美,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绚烂天空的璀璨星星。但影视的介入,使两部作品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张艺谋^①因执导《红高粱》^②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大奖“金熊奖”一炮而红。而阿城小说的古雅闲逸却不易以画面形式展示出来。与之相似

① 张艺谋是中国导演中对新时期小说情有独钟的一个,从拍摄《红高粱》开始,之后有1990年《菊豆》(刘恒《伏羲伏羲》),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妻妾成群》),1992年《秋菊打官司》(陈源斌《万家诉讼》),1993年《活着》(余华《活着》),1994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李晓《门规》),1996年《有话好好说》(述平《晚报新闻》),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施祥生《天上有个太阳》),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鲍十《纪念》),2000年《幸福时光》(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等。

② 莫言从1981年发表《春夜雨霏霏》以后,先后发表《弃婴》《复仇者》《爆炸》等多部作品,但未引起文坛关注,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关注。《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让他一夜成名。紧接着1987年5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红高粱家族》。





的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谁都不会否认它们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却不是读者意义上的经典。然而文字的细读能让你听到内心的声音,亦即布鲁姆所谓的“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的相遇”^①。它们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最强有力的诗在认知和想象上都太艰深,在任何社会阶层中,或不论在什么性别、族裔以及民族中,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深入阅读它”^②。那么,这些作品如何能普遍共享呢?在一个传媒决定其未来的时代,它们如何被经典化?这将对论者长期而艰巨的追问。

①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经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经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镀金时代的精神档案：重读《废都》



毁誉一身的《废都》的开禁或者可以视为时代场景的变迁，人们对小说的道德诉求不再过于苛求。回溯当年的围剿大潮，实际上源自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那是自晚清到今天深受梁启超“小说与群治关系”^①理论影响的结果，认为小说应当担负起国家文化前途的命运，应微言大义，文以载道。

但若抛开道德桎梏，跳出情色外壳，理性的读者会发现在这样一部遍身缺陷的作品里面有一层坚硬的内核，它的金子般的品质被粉红色的口水湮没了，至今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审视。夏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记录它们的意义可能只是在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提供一份荒凉的心灵标本，为一个全球化的自由时代提供一份不自由的证据。^②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废都》，它的优秀之处在于为我们这个资本即自由的镀金时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心灵和精神档案。

《废都》的评价史

《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城市题材小说，在此之前，贾平凹已经以他的商州系列和《浮躁》等长篇小说扬名文坛。1993年6月，《废都》的问世，挟裹着“百万稿酬”和“当代《金瓶梅》”的强势宣传，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读和评论热潮，被称为“废都现象”，几个月后作品旋即被禁。与一千多万册的销售成绩对比鲜明的则是批评界几乎一边倒的骂评声：指斥其

^① 梁启超(1873—1929)《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载《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云：“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

^② 夏榆：《杨家营纪事》，《2005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